



李商隐全集

[唐] 李商隐 著

附李贺诗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李商隐全集

[唐] 李商隐 著

附李贺诗集

朱怀春 曹光甫 高克勤 标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李商隐全集

附李贺诗集

(唐) 李商隐 著
李贺

朱怀春 曹光甫 高克勤 标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5 字数 333,000

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,000

ISBN 7-5325-2493-0

I·1265 定价: 24.00 元

前 言

李商隐(约812—858),字义山,号玉溪生,又号樊南生。祖籍怀州河内(今河南沁阳),后迁居郑州。郑州有商隐祖坟祖产,故商隐也视郑州为故乡。他早年习业玉阳王屋山。据元耶律楚材《王屋道中》诗:“行吟想象覃怀景,多少梅花拆玉溪。”又据商隐《莫相国令狐公文》:“故山峨峨,玉溪在中。”可推知玉溪即在王屋山,《玉溪生诗集》命名缘此。唐文宗开成中,商隐移家关中,居住长安京郊樊南。他在《樊南甲集序》中自称“樊南生”,又云:“十年京师寒且饿,人或目曰:韩文杜诗,彭阳章檄。樊南穷冻,人或知之。”后即以樊南命名其文集。

商隐自述“我系本王孙”,确是事实。他是晋凉武昭王李暠的苗裔,唐高祖李渊是李暠第七代孙,可见家世曾非常显赫。而从他高祖李涉起,几代人都官卑职微,门庭衰落。他父亲李嗣,曾任获嘉(今属河南)县令,后为镇浙者辟为幕僚。商隐就出生在这式微的书香门第。他从小颖悟,“五年诵经书,七年弄笔砚”(《上崔华州书》)。家境贫寒,随父宦游飘泊。十岁时父亲去世,境况顿显狼狈。《祭裴氏姊文》述当年情状:“某年方就傅,家难旋臻。躬奉板舆,以引丹旌。四海无可归之地,九族无可倚之亲。”商隐奉母护丧回郑州,其间从堂叔某处士受经习文。商隐十二岁父丧除服,为养家糊口,“乃占数东甸,佣书贩春”(《祭裴氏姊文》),卜居东都洛阳,靠替人抄写

文书和出卖劳力谋生，相当艰辛。

唐文宗太和三年(829)，商隐十八岁。三月，令狐楚任东都留守。商隐登门献文，大为令狐楚赏识。令狐楚让商隐与其子令狐绹等交往，切磋艺文。同年十一月，令狐楚任天平军节度使，招商隐为幕僚，辟署巡官。从此“将军樽旁，一人衣白”(《莫相国令狐公文》)，商隐依傍恩师令狐楚习吏习文。当时官场文书通行今体(即骈文)，令狐楚是今体章奏高手，商隐得令狐楚悉心指点，很快精于此道，且能青出于蓝。他又感激，又自豪，以为从此取青紫如拾芥。不料从太和六年(832)起，他屡次应试，屡次被黜，颇感愤愤不平。

太和七年(833)，崔戎任华州刺史，很器重商隐。次年崔戎改任兖海观察使，辟商隐至幕府，掌章奏。不久崔戎卒，商隐痛失所依。开成二年(837)，令狐父子作奥援，商隐得中进士。《上令狐相公状》(五)就表达了他的感恩之情。当年冬令狐楚卒，商隐驰赴兴元，护丧归京师。途中写下名篇《行次西郊作一百韵》。

开成三年(838)，商隐二十七岁，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。王茂元厚爱商隐，后商隐娶其女为妻，琴瑟甚谐。王茂元属李德裕党，而令狐楚则属牛僧孺党，其时牛李党争激烈，商隐投靠王茂元，由此跌入不能自拔的政治漩涡，遭牛党嫉忌，终其一生厄运缠身。当年商隐试博学宏词科即被某中书抹名，他有感而作《安定城楼》诗，有“不知腐鼠成滋味，猜意鸱雏竟未休”之句。

开成四年(839)，李商隐正式登上仕途，任秘书省校书郎，不久即调补弘农尉。审案时因不愿株连滥杀而邀功，活囚数人，大拂观察使孙简之意，遭训斥。商隐愤而作诗《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》，欲辞职不干。后姚合取代孙简，商隐才继续留任。不过“俸微五斗”的九品尉职备受屈辱，所以商隐于开成五年(840)移家关中后辞尉从调，赴潭州刺史杨嗣复之招，游江潭，数月后回京。

唐武宗会昌二年(842)，李德裕秉政。商隐以书判拔萃，授秘书省正字。遽遭母丧，回家守制。会昌四年(844)返故乡营葬，后移家

永乐县。会昌五年(845)十月,商隐服阙入京,重官秘书省正字。第二年春武宗驾崩,李德裕遭贬,政治形势急转直下。秘省清资,可通天阶,一因母丧,一因驾崩,失尽时机,商隐懊丧不已:“谁料苏卿老归国,茂陵松柏雨萧萧。”(《茂陵》)

唐宣宗大中元年(847),商隐三十六岁。二月,李德裕亲信郑亚遭贬外任,出为桂州刺史、桂管防御观察等使。郑亚辟商隐入幕,奏掌书记。是年冬,商隐奉命出使南郡。二年正月自南郑归,摄守昭平郡事。虽然是临时代职,商隐却极其认真,有施政雄心。这是商隐一生唯一一次独当一面的行政机会,虽因时间短暂而未见实绩,但从他写的《异俗二首》中可见其胆识与勇气。二月,郑亚再贬为循州刺史,商隐留滞荆巴。冬初还京,选为周至尉。

大中三年(849)十月,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镇徐州,招商隐入幕,奏为判官,直至大中五年(851)卢弘止卒于镇。时令狐绚官至相位,商隐写文求情,被补为太学博士,“在国子监太学,始主事讲经,申诵古道,教太学生为文章”(《樊南乙集序》)。这年秋初,妻王氏卒,商隐心灵留下一道伤痕,不少情真意挚悼亡诗即由此而发。时柳仲郢任梓州刺史、东川节度使,奏辟商隐节度书记,后又改判上军,旋检校工部郎中。冬,商隐被差赴西川推狱。

商隐在东川幕,“五年从事霍嫫姚”(《梓州罢吟寄同舍》),虽宾主尚相得,生活亦安定,仍感孤独落寞,心境苍凉空寂,渐耽悼悦。《樊南乙集序》云:“三年以来,丧失家道,平居忽忽不乐,始克意事佛。方愿打钟扫地,为清凉山行者。”他常与衲子往来吟唱,还在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,自出财俸,特创石壁五间,金字勒《妙法莲花经》七卷,虔心礼佛。商隐还精于书法,令狐绚曾令他“书元和旧诗”(《上兵部相公启》)。《宣和书谱》收商隐作品《正书月赋》、《四六本薰草》,赞云“字体妍媚,意气飞动,亦可尚也”。《玉堂嘉话》载:“李阳冰篆二十八字,后有韦处厚、李商隐题。商隐字体绝类《黄庭经》。”《金石录》也载商隐所书碑数种,惜皆已不传。

大中十年(856),柳仲郢入朝任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,充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商隐随柳进京,任盐铁推官。为执行公务,商隐于大中十一年(857)游历江东,感六朝兴亡而多咏史。大中十二年(858),盐铁转运使易人,商隐废罢,还郑州,未几病卒。时人伤悼,赋诗吊唁。崔珣《哭李商隐》七律二首,其警句为:“词林枝叶三春尽,学海波澜一夜干。”赞誉备至。又云:“虚负凌云万丈才,一生襟抱未曾开。”才高命蹇,商隐九原有知读了也当唏嘘呜咽。

二

晚唐社会情势岌岌可危。与李商隐“平生风义兼师友”的刘蕡,于文宗太和二年(829)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试对策道:“今海内困穷,处处流散,饥者不得食,寒者不得衣,……官乱人贫,盗贼并起。土崩之势,忧在旦夕。”决非危言耸听。李商隐为数不多的现实政治诗,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代。

敢于直言极谏的刘蕡还在对策中猛烈抨击“黄门太横,将危宗社”,力主“揭国权以归其相,持兵柄以归其将”。宦官专权误国,成为中晚唐一大弊病。“自元和末,阉寺权盛,握兵官闾,横制天下。天子废立,由其可否,干挠庶政。”(《旧唐书·刘蕡传》)唐宪宗、敬宗皆为宦官所弑。刘蕡的对策博得士林的震惊和感佩,然而触怒黄门,刘蕡被黜,后遭宦官诬陷,贬为柳州司户参军,含冤死去。李商隐闻讯后,冒风险,披肝胆,接连写四诗哭奠刘蕡。如:“上帝深官闭九阍,巫咸不下问衔冤。”(《哭刘蕡》)“路有论冤谪,言皆在中兴。”(《哭刘司户蕡》)“已为秦逐客,复作楚冤魂。”(《哭刘司户二首》)颂扬刘蕡,为他鸣冤叫屈,同时揭露朝廷昏聩,其矛头直指宦官集团。

《旧唐书·文宗纪》载“帝以累世变起禁闾,尤侧目于中官,欲尽除之”。太和九年十一月,在文宗授意下,宰相李训、凤翔节度使郑注伏兵内廷,诈言金吾仗舍石榴树有甘露。帝令左右军中尉仇士

良、鱼弘志率诸内臣往视，想乘机将阍竖一网打尽。不料机事不密，反遭其祸，李训、郑注被杀，连未曾预谋的宰臣王涯、贾餗、舒元舆等也遭族灭，同时株连者千余人，酿成“流血千门，僵尸万计”的惨祸，史称“甘露之变”。事变后，宦官气焰更加嚣张，“迫胁天子，下视宰相，陵暴朝士如草芥”（《通鉴》）。慑于淫威，一班文人学士大抵噤若寒蝉，三缄其口。商隐独具风骨，既撰文，又作诗，鲜明表达对“甘露事变”的见解。《邵氏闻见后录》载商隐佚文，并评论道：“李义山《樊南四六》集载《为郑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》云云。当北司愤怒不平，至诬杀宰相，势犹未已；文宗但为涯等流涕，而不敢辩。义山之表谓‘徒思改作，未可与权’，独明其无反状，亦难矣。”商隐不仅文章难能可贵，还有不少诗分析评价这一时事，肯綮而犀利，如《有感二首》、《重有感》、《故番禺侯以赃罪不辜事觉母者他日过其门》等，指斥宦官的凶残屠杀，对无辜受害者则深表同情，对唐文宗则惋惜其用人不当，功亏一篑，对首事的李训、郑注之流则基本持批判态度。《有感二首》是直接反映“甘露事变”的政论性佳作。

晚唐的另一心腹之患是藩镇割据，商隐诗对此亦颇关注。藩镇崛起，中央政权衰弱，双方对峙或激战。这一局面的形成，有其深刻的政治历史原因，中央政权的腐败，权力再分配的角逐等，都有可能导政“官逼官反”，而新王朝的建立也往往肇始于割据。唐王朝的最终覆灭，藩镇割据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。希望和平稳定，反对割据分裂，是当时大多数人的心态，商隐同样如此。他早年的《韩碑》诗就用浓墨重彩颂扬贤相良将平定淮西之役的煌煌战功。太和元年（827）横海军节度使（沧景）李同捷抗命，成德军节度使王庭凑助乱，唐文宗命七道兵马征讨，旷日持久，直至太和三年方臻底平。商隐《隋师东》诗反映了这一事件。对由于王师的腐败，造成“积骸成莽”百姓遭殃的严重后果，李商隐有清醒的批判意识，与杜甫有些战争诗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完全吻合。商隐还认为：“但须鸞鷲巢阿阁，岂假鸱鸢在泮林。”意谓朝廷小人秉政，致使藩

镇猖獗，也是诛心之论。但就总体而言，商隐还是赞同中央政府平叛的。武宗会昌三年（843）昭义镇刘稹拒旨反叛，朝廷用兵，商隐积极声讨。《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》诗：“鱼游沸鼎知无日，鸟覆危巢岂待风。”可谓旗帜鲜明。相反，如果朝廷对藩镇姑息迁就，商隐则予以讽刺。开成二年（837），唐文宗命寿安公主下嫁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，意图联姻怀柔。商隐当即直言此举荒唐：“事等和强虏，恩殊沐本枝。四郊多垒在，此礼恐无时！”（《寿安公主出降》）

晚唐边患未靖，吐蕃、回鹘、党项先后入寇，朝廷穷于应付。原因固然很复杂，国势衰微是根本，边帅侵扰滋事也是导致纷争的重要缘由。会昌五六年间，党项反，攻陷邠宁盐州界城堡。武宗发诸道兵征讨，至唐宣宗大中四五年连年无功，戍愤不已。最后党项虽平，而国家元气也大伤。商隐对穷兵黩武持厌恶态度，《汉南书事》诗云：“几时拓土成王道？从古穷兵是祸胎。”与杜甫诗《兵车行》嘲讽“武皇开边意未已”主旨一脉相承。

宦官专权、藩镇抗命、四郊多垒，唐王朝内外交困，风雨飘摇。对这一时期作忠实、全面而深刻反映的力作，不能不首推商隐《行次西郊作一百韵》。题中西郊指京西凤翔府。映入眼帘的农村景象是触目惊心的一派荒芜凋敝。王畿尚且如此，外府州县当然更甚。诗歌不仅描绘现象，更通过一个老农之口夹叙夹议，深层次地揭示出现象背后隐藏着各种社会危机。大要有藩镇闹事，王权旁落；外族入侵，御侮乏术；官吏贪酷，税赋繁重；上层穷侈极欲，下层受冻挨饿；官逼民反，盗贼蜂起等等。应当说这些揭示都相当真实、尖锐和愤激，跳动着诗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。诗人感叹是人为因素造成这一切混乱局面，多少地看到了那个动荡社会的症结。这首诗落笔如椽，在广阔的背景上综述一代时事，巨细毕现，情理交织，不愧是一幅气势恢宏的时代长卷图。它是继杜甫《北征》、《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后又一长篇诗史杰作。

咏史诗是准政治诗，可看作是政治诗的一个分支，因为咏史的归宿往往在于讽今。商隐的少量咏史诗也不例外。如唐明皇与杨贵妃事，白居易写《长恨歌》，哀感顽艳，虽有戒讽，但大意还在于颂扬明皇对于贵妃的痴情。商隐则不然，《华清宫》云：

华清恩幸古无伦，犹恐蛾眉不胜人。

未免被他褒女笑，只教天子暂蒙尘。

在轻松幽默的揶揄中，包含极严肃的批判主题，几乎直接将唐明皇与周幽王、杨贵妃与褒女划上等号。如此吟咏当朝至尊，除唐代而外，历朝罕见。这当然缘于唐代政治较为宽松开明，但更主要的还是李商隐的胆识与勇气，这种毫无顾忌“指斥乘舆”的诗毕竟在唐代也并不太多。题旨与此相类的尚有《马嵬二首》，讥笑唐明皇“如何四纪为天子，不及卢家有莫愁”。

商隐对于亲历的晚唐诸帝如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，当然不便直露指斥，则借咏古帝王史事以讽。他的《咏史》警句云：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破由奢。”既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，也是对当世君王奢靡之风敲响的警钟。如唐敬宗少年继位，童昏失德，只知夜猎、击球、宴饮。唐文宗初即位时下诏有“别诏宣索纂组雕镂不在常贡内者，并停”之语，显指前帝敬宗常别诏需索此类喜好物。综合上述各点，再来看商隐《富平少侯》诗，不难发现，诗中的“富平少侯”明显是在替敬宗画像。集中一些咏古帝王醉生梦死之作如《吴宫》、《北齐二首》等，大抵影射敬宗。

晚唐诸帝或虔奉释典，或笃信道教，而疏于任贤使能，即商隐《贾生》诗所讽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”。以唐武宗为例，在禁中筑望仙馆，于三殿修金箓道场，召道士赵归真、刘玄靖等入宫，封以高官厚禄，师事之。武宗崇道黜佛，会昌五年下诏拆毁天下寺庙四千六百余所，招提、兰若四万余所，二十六万余僧尼还俗。他还服食金丹膏药，企图长生，结果是年仅三十三岁即短寿夭折。商隐《汉宫词》“青雀西飞竟未回，君王长在集灵台”，《茂陵》“玉桃

偷得怜方朔，金屋修成贮阿娇”，《瑶池》“八骏日行三万里，穆王何事不重来”等，都是专讽学仙妄求，有很强的针对性。

商隐还有些诗吟咏古迹名胜，兼感慨史事，也有很深寓意，如七律《井络》咏诸葛亮八阵图，咏蜀君杜宇、先主刘备，结句最为警策：“将来为报奸雄辈，莫向金牛访旧踪。”这是对藩镇割据蠢蠢欲动而发的警告。清屈复《玉溪生诗意》述此诗云：“以山川之险，武侯之才，昭烈之主，尚不能一统天下，而况其它哉！所以深戒后来也。”清田笈山也评论道：“足褫奸雄之魂，而冷其觊觎之心。”（冯浩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引）可见玉溪生的咏史诗并非逞才矜博的泛泛之作，而是融入了批判现实的忧国忧民之心，这与他的政治诗在本质上是相通的。

上述诗反映的是现实世界，虽然也很可观，但就其深度广度而言，毕竟要逊杜甫一筹，还不足代表商隐诗的主要成就。商隐诗最擅胜场的是对心灵世界的发掘与开拓，把对生活、理想、爱情、婚姻等方面的丰富感情表达得婉曲尽致，他不愧是位抒情大师。

李商隐善写梦。人生如梦，梦也如人生，商隐把这两种境界搅动得水乳不分，将梦与人生打成了一片。这其实是很可悲的，现实的窒息与碰壁，使他不得不在梦中求得慰藉与解脱。如他的写梦名作《过楚宫》：

巫峡迢迢过楚宫，至今云雨暗丹枫。

微生尽恋人间乐，只有襄王忆梦中。

这是在借咏襄王的酒杯，浇自己心头的垒块。宋玉《高唐赋》中的襄王并不如此可怜巴巴，除了云雨梦，他还有许多可以想象的人间乐。缺少人间乐，而苦忆梦境中悲欢离合的，只能是商隐自己。商隐一生有许多梦。早年有颇为自负的青云梦：“我是梦中传彩笔，欲书花叶寄朝云。”（《牡丹》）“十年长梦采华芝。”（《东还》）中年寄人篱下，四海飘泊，又颇多思乡梦：“归期过旧岁，旅梦绕残更。”（《五言述德抒情诗》）还有名心未泯的乞怜梦：“山驿荒凉白竹扉，残灯

向晓梦清晖。右银台路雪三尺，凤诏裁成当直归。”（《梦令狐学士》）晚年则心境枯寂，不乏禅梦：“炎方忆初地，频梦碧琉璃。”（《五月六日夜忆往岁秋与澈师同宿》）很明显，这些都是在借梦抒情。梦可能有真有假，而寄托的情则是绝对的真。商隐的七言长诗《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》，沈厚堃《李义山诗集辑评》引何焯批语：“迷梦即所以自寓。”冯浩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也笺道：“假梦境之变幻，喻身世之遭逢也。”商隐的梦诗，大抵皆可作如是观。

商隐也还有绮梦。他学仙玉阳时，曾与女冠有过恋情，《燕台诗四首》、《嫦娥》诗所咏均与此有关。后又与洛中里娘柳枝相爱，好事未谐，柳枝为东诸侯取去，商隐赋《柳枝五首》并有长序，俱道其事。此外尚有“寻芳不觉醉流霞，倚树沉眠日已斜。客散酒醒深夜后，更持红烛赏残花”（《花下醉》）等绮诗。因而商隐时有“春梦乱不记”（《乐游原》）“别馆觉来云雨梦”（《少年》）等绮梦也在情理之中。他最奇特的一首记绮梦的诗是《闺情》：

红露花房白蜜脾，黄蜂紫蝶两参差。

春窗一觉风流梦，却是同衾不得知。

闺中少妇在同衾裯的丈夫身边做了一个风流梦，与她的情人幽会寻欢，丈夫虽然近在贴身，却全然无知。是的，禁锢形体容易，禁锢思想万难，恋情是如此，亲情、友情、宦情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就“闺情”而言，此诗“这个题材，恐怕是古今闺情诗中绝无仅有的”（施蛰存《唐诗百话·李商隐七言绝句四首》），可见商隐对绮梦非凡的想象力与开拓力。

说到绮情，商隐最为人称道和最为聚讼纷纭的，就是他的无题诗。以“无题”命诗，是商隐的独创，尤多用于七律。凡叙写爱情、艳遇、隐衷、感遇，或对时事政治、社会生活诸方面寓以寄托，作者不愿显言或不便明言的，则有意隐讳，画龙而不点睛，概以“无题”命篇。此类诗集中共有十五首。有些诗仿效《诗经》，摘取诗篇首句开头二字命题，如《锦瑟》、《碧城》之类，似有题而实亦无题。此类诗集

中有近三十首。这些无题诗，在作者避实就虚不落痕迹，固是别出心裁绝顶聪明的处理；而在读者，在逆反心理驱动下，偏要猜透哑谜就虚坐实，想当点睛手，却难免弄巧成拙。无题诗同商隐其他诗一样，“味无穷而炙愈出，钻弥坚而酌不竭”（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引杨亿语）。正因为无题诗神秘莫测，愈益激发起历代学人才子如痴似醉地探赜索隐，笺注闡说连篇累牍，歧见百出莫衷一是，于是形成一门积淀深厚的“无题诗学”。

其实，商隐无题诗大抵皆叙恋情，而又多为失恋的单相思。那种刻骨铭心的相思如此无望，如此痛苦，却又那么执着，那么充满哀伤的美感。试看以下无题诗名句：

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

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

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。

千百年来不知被多少人兜上心头，传诵着，咀嚼着，品味着，在它的巨大魅力中倾倒、镇静、反思、缓解。它形象地表达了人类共通的感受，因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普遍引起共鸣，有无穷的生命力。商隐无题诗中的优秀作品，堪称爱情之绝唱。

然而，无题诗也绝不仅仅是恋情诗。商隐曾多次在诗文中表白自己的诗歌有底蕴：“楚雨含情皆有托。”（《梓州罢吟寄同舍》）“一自《高唐》赋成后，楚天云雨尽堪疑。”（《有感》）“巧啭岂能无本意？”（《流莺》）“盖以徘徊胜境，顾慕佳辰，为芳草以怨王孙，借美人以喻君子。”（《谢河东公和诗启》）清纪昀云：“《无题》诸诗，大抵祖述美人香草之遗，以曲传不遇之感，故情真调苦，足以感人。”（转引自张采田《李义山诗辨正》）是很有斟酌，很有分寸的评论。因此，商隐的无题诗，又可说是无题之《离骚》。

商隐另有一类咏物写景诗，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同样将它浸染上浓厚的心灵色彩，不但重在神似，而且重在抒情。早年在崔戎充

海幕中，商隐赋《初食笋呈座中》七绝，对食用“嫩箨香苞”的新笋表示了深深的惋惜与不平：“皇都陆海应无数，忍剪凌云一寸心！”新笋不受剪伐，即能凌云挺拔，以比喻才士不受摧抑，自能展翅青云。唐人常称年轻而有才的人为“玉笋”（见《新唐书·李宗闵传》），则此诗咏物与咏人已密勿无间。名篇《蝉》诗，咏物不即不离，借蝉之清高悲嘶托寓自己襟怀，备受后世激赏，清朱彝尊曾誉此诗为“咏物最上乘”。另一首名篇《流莺》曰：

流莺飘荡复参差，度陌临流不自持。

巧啭岂能无本意？良辰未必有佳期。

风朝露夜阴晴里，万户千门开闭时。

曾苦伤春不忍听，凤城何处有花枝？

末句从初唐诗人李义府《咏乌》“上林多少树，不借一枝栖”化出。诗当作于客乡异地，思念京城，眷恋功名，可惜“凤城”（即京师）不借一枝栖息，故“伤春”而哀苦。一片流落飘荡之情，借咏莺和盘托出。汪辟疆《玉溪诗笺举例》云此诗“义山借流莺寓感也”（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63年第4期），极为中肯。商隐的咏物诗形神兼备，物我交融，确乎是上乘之作。

商隐的写景诗也有上述特点，寓情于景，借景摭情。他的五绝压卷之作《乐游原》云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瑰丽之景，寓衰飒之情，既是大唐帝国回光返照的绝妙写真，也是老骥伏枥前途无望自身境遇的艺术再现。浅显白描的语言蕴含如此形象深厚的情愫，使人叹为观止。商隐对描写黄昏情有独钟，因为斜阳西下，韶华转瞬即逝，他既留恋惋惜，又惆怅无奈，与他的遭际与心境最为吻合。所以他的写景名句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”（《晚晴》）、“参差连曲陌，迢递送斜晖”（《落花》）、“虹收青嶂雨，鸟没夕阳天”（《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》）等，都与之结下不解之缘。举一可以反三，商隐诗的景语大抵皆含情语，著有我之色彩。

以上择要介绍了商隐反映现实与反映心灵的两大部分诗作。

以下简要归纳一下商隐诗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色。

秾艳绮丽的外衣包裹着愤懑凄苦的内核，这是商隐诗的基本风格。商隐《戏题枢官草阁三十二韵》诗自道“我有苦寒调”“听我苦吟诗”，准确地为他的诗歌创作定下了基调。他深深挖掘内心世界的种种创伤，给予精致包装，让人隽永回味。外在形式的美与思想感情之苦在商隐诗中得到了有机的、和谐的统一。对于商隐诗的秾丽，前人也有非议，敖陶孙《诗评》云：“李义山（诗）如百宝流苏、千丝铁网，绮密瑰妍，要非自然。”这其中有的是误解，有的则是对商隐少量齐梁体格的艳体诗的批评。诗歌发展到晚唐，齐梁声色内容又渐渐回潮，这与衰世耽溺淫乐有关，也与朝廷倡导有关。《云溪友议》载：“开成元年秋，高锴复司贡籍。上（文宗）曰：‘所试赋，则准常规，诗则以齐梁体格。’乃试《琴瑟合奏赋》、《霓裳羽衣曲》诗。”上行下效，在世风趋会中，商隐难免浸染，也确有如“百宝流苏”“要非自然”的瑕疵。但从总体上看，商隐诗是金玉其外，精粹其中，完全适用于题旨的表达。正如范元实《诗眼》所说：“义山诗，世人但称其巧丽与温庭筠齐名。盖俗学只见其皮肤，其高情远意，皆不识也。”

商隐少量诗用通俗质朴白描的语言直抒胸臆，也不失为佳作。但他偏爱（或不得不）创造朦胧曲折的诗境，费人猜详，很难一眼破译，甚至永远无法破译。他的朦胧诗与白居易“老妪能解”的通俗诗有着强烈反差，然而各有独诣，各领千秋。有人则对商隐“半明半暗”的朦胧诗风持否定态度。清毛奇龄《诗话》引张杉（南士）语说：“生平不喜观李商隐诗。旧谓商隐堆垛辘轳，号獭祭鱼，此病犹小。其最不足处是半明半暗，近通近塞，迷闷不得决。”如果朦胧而至于晦涩，甚或不知所云，那末张杉的批评也不无道理。可是商隐的朦胧诗决非空洞无物的故弄玄虚或文字游戏，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核，撩开云幌雾纱，自可睹见国色天香。张杉的“迷闷”，其考语施之于商隐，可谓无的放矢。

造成诗意朦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如意象的不确定和多义性，

意象间难以捉摸的跳跃性等。意象的多义性,体现了商隐诗多用比兴的另一特色。贺裳《载酒园诗话》云:“魏晋以降多工赋体,义山犹存比兴。”朱鹤龄笺本序也称“义山之诗,乃风人之绪音,屈宋之遗响”。由于比兴的大量运用,由《诗经》而引出“诗无达诂”的著名论断。商隐诗托物寓意,言此意彼,很难切实准确把握其脉搏,也可归入“诗无达诂”之列。

钱钟书先生以为:“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,犹昌黎文与韩诗也。”(引自周振甫《李商隐选集·前言》)道出了商隐以骈文入诗的一大特色,它正如韩愈以散文入诗一样,备受世人瞩目。商隐诗多律体,严格注意音韵、对仗,选声设色,极有讲究,带有明显的骈文胎记,这与他是骈文高手密切相关。以骈体入诗,还表现在商隐诗大量用典,有些诗“一篇之中,用事者十七八”(黄彻《碧溪诗话》)。商隐用典还有避熟就新、活用反用巧用等特点,使之推陈出新,境界顿异。用典也是造成商隐诗含蓄隽永、朦胧曲折的重要原因。商隐用典高明贴切,为历代所叹赏,也为历代所诟病。叹赏者膜拜规摹之,如北宋初西昆诸公。诟病者则指责商隐,谓“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,以其用事僻涩”(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二十二引《冷斋夜话》)。其实,对于商隐用典盲目崇拜,亦步亦趋,流于以学问为诗的恶果,不啻买椟还珠,不足为训。至于抓住其少数篇章用事堆砌僻涩而予以全盘否定,未免因咽废食,有失公允。当然,用典过多,造成读者阅读和理解上“隔”的弊端,商隐诗也难辞其咎。

宋初杨亿《谈苑》云:“义山为文,多简阅书册,左右鳞次,号‘獭祭鱼’。”“獭祭鱼”说因而成为商隐诗文创作的定评。事实上这恐怕是杨亿的臆测或夫子自道,商隐未必在创作时“简阅书册,左右鳞次”。商隐学富五车,才情具赡,不会如村学究般文思蹇涩,临渴掘井。佐证有三:1.《安平公诗》:“丈人博陵王名家,怜我总角称才华。……顾我下笔即千字,疑我读书倾五车。”2.《咏怀寄秘阁同僚二十六韵》:“自晒成书簏。”3.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:“自是(商隐)始为今

体章奏，博学强记，下笔不能自休。”细味之，商隐自诩“书麓”，又“博学强记”，实无需“獭祭鱼”式枯涩创作。杨亿厚诬，后人沿波众喙一辞，恐是一宗错案。

商隐诗特色简述如上。从承传关系来看，商隐诗“比兴”取法《诗经》，“香草美人”仿效《离骚》，继承了古典诗歌创作的优秀传统。对商隐最有直接影响的当数杜甫。商隐诗中从内容、制题到句律都有意追慕杜甫，不仅临摹得真，而且得杜家神髓。蔡宽夫《诗话》云：“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，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，唯义山一人而已。”当非虚誉。商隐对后世多有影响，晚唐韩偓的《香奁集》已露端倪，大量模仿商隐艳体诗。到了宋初，商隐诗备受尊崇。刘攽《中山诗话》云：“祥符、天禧中，杨大年（亿）、钱文僖（惟演）、晏元献（殊）、刘子仪（筠）以文章立朝，为诗皆宗尚李义山，号‘西昆体’。后进多窃义山诗句。尝内宴，优人有为义山者，衣服败裂，告人曰：‘吾为诸馆职捋撻至此。’闻者欢笑。子仪画义山像，写其诗句列左右，贵重之如此。”由于这些达官贵人的倡导，“西昆体”曾风靡一时。但它生吞活剥，模拟剽窃，专注词章秾艳和堆砌典故，正所谓得其皮毛而遗其精髓。西昆之失，其咎不能怪罪于商隐，因而将商隐视为西昆鼻祖，一并加以攻讦，显然有失偏颇。

三

玉溪诗固是诗苑奇葩，樊南文也是文囿异卉，同样令人刮目。现存樊南文共 350 余篇，按数量多寡分类统计如下：状 152 篇、启 76 篇、表与祝文各 27 篇、祭文 26 篇、牒 12 篇、杂记与黄篆斋文各 6 篇、书与碑铭各 5 篇、序与赋各 4 篇、行状 3 篇、箴与传各 1 篇。其中大部分文章都冠以“为安平公”、“为河东公”等等名号，系代人捉刀。商隐长期辗转作幕僚，拟撰各种公私应用文书是他“秘书”职责对府主应尽的本分。另外由于文名籍籍，为饥驱糊口，也不免卖